

中国中古史研究
——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

第一卷

中华书局

《中国中古史研究》第一卷

编辑委员会

佐川英治(东京大学)

松下憲一(北海道大学)

赵立新(台湾大学)

郑雅如(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魏斌(武汉大学)

徐冲(复旦大学)

发刊辞

在“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成功举办三届之后,我们向学界呈上这本小小刊物。

本会 2007 年夏天由中国和日本学界几位魏晋南北朝史青年研究者发起。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举办了第一届“中国中古史中日青年学者联谊会”。虽然规模有限,但仍然受到多方积极评价。随后,更引起台湾学界几位青年研究者的呼应,2008 年第二届遂发展为三方参与,活动名称也正式确定为“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2009 年第三届由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联合主办,2010 年第四届更将移师台湾大学历史系,在学界的影响力渐次扩大。

联谊会创设的基本理念,在于以 1970 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学者为主体,构建一个中国中古史研究的共同平台。所谓“共同平台”,要在致力于不同社群的研究者间的视野开放、信息交流、思想互动乃至研究合作与友谊联结。这一理念贯穿于前几届联谊会中,也得到了学界的相当认可。我们认为,与当今名目繁多的各种“国际学术研讨会”相比,本会的特质不仅在于构成主体的青年化,更在于“展示性”与“生产性”的并重。这就需要更富建设性的再生产方式,来与一年一度的“会议”形成互动。会刊之创设,于此生焉。

会刊以《中国中古史研究》为名。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名称无任何“历史分期”意义上的指向,仅仅表示联谊会成员的大体关心范围所在。具体而言,上至秦汉,下迄唐宋,凡属青年学人有心有力之作,均在本刊刊登之列。在功底扎实、立论谨严的考证式作品之外,尤其重视新史料的发掘与新领域的开拓,鼓励以新的观念和方法来重构、更替历史图像的尝试。同时,还将致力于以“书评”和“研

究述评”的方式来促进不同学术社群间的了解与对话。本刊虽然微不足道,仍愿以依托于联谊会并与之互动的方式,来参与这一代青年学人的成长,并寄望于未来能促成一种中国中古史研究新局面的形成。

在一个学术评价已然量化的时代,一份不会被计入“成果”的小小刊物,仍然能够因学术理想的追求和信息手段的发达而生存并且生长下去,这是我们用心用力的信念所在。

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

2009年11月

综 述

综 述

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新动向

佐川英治、阿部幸信、安部聡一郎、戸川貴行

近几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日本再次活跃起来,承担起这次研究风潮的以1970年代出生的青年学者为中心。渡边信一郎评价近几年魏晋南北朝研究时,认为“官僚制和专制国家研究代替了贵族制研究,秩序构造、礼制祭祀研究、网络理论代替了阶级支配和身份制研究,都城、都市研究代替了农业、农村研究。总体上来看,构造和秩序代替了发展和对立,渐渐成为研究的主流”(《中国历史研究入门》,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77页)。这种问题意识的变化在青年学者们中尤显突出。他们到中国留学,接受中国学者的直接指导,并且积极参加实地调查,从而增加了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对文书、石刻、吴简等原始史料的关心度较高,在日常研究当中应用数据库和画像处理等数码技术,等等。以上种种都被视为是青年学者们的特征。

把以上所述青年学者的研究动向,分为:(1)东汉史、(2)三国西晋、(3)东晋南朝、(4)五胡北朝四个阶段,分别由阿部幸信、安部聡一郎、戸川貴行、佐川英治四人进行介绍。

一、东汉史研究的新动向

在日本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关于东汉时代的研究比较落后。其中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1)在日本史学界,重视实证主义的学风比较强大,而东汉时代缺乏可信的文献史料,一直被认为是研究难度较大的时代。

(2)在1950~1970年代流行的时代区分论的影响下,研究者的关注点集中

于秦汉交替期、汉魏交替期,因此未能明了夹在两个时代中间的东汉时期的特征。

(3)1980年代以后,随着出土史料的增加,兴起利用出土史料的研究之风。而比起西汉,东汉时期的出土文字史料较少,因此对于东汉时期的关注也相对较少。

作为上述状况的反映,青年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也少于西汉和魏晋时期,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较多。在以前的研究中被回避的东汉史研究尚有很多有待开拓的地方,目前正吸引着很多青年学者。

与以上三点对应,下面把近几年中青年学者们的研究动向分为三大部分进行介绍:

文献史料的重新检讨

首先介绍的这个动向意在通过彻底重新检讨与东汉时代相关的文献史料,揭露过去所论述的东汉时代的虚像,同时试图找出利用文献的新方法。安部聪一郎通过《后汉时代相关史料的再检讨》和《关于袁宏〈后汉纪〉、范曄〈后汉书〉史料的著作过程》,重新整理了《后汉纪》和《后汉书》等代表性的关于东汉时期的史料。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党锢的“名士”再考》,认为《后汉书》受到执笔当时的东汉时代观的影响,所以在此基础上被人们讨论的东汉末的“名士”观不能视为东汉末期的实际情况。阿部幸信《后汉车制考》和《后汉服制考》二文,引用《汉书》和《续汉书》中有关车服制度的不同记载,论述了《后汉书》的史料特质。佐藤達郎通过《胡广〈汉官解诂〉的编纂》、《应劭〈汉官仪〉的编纂》二文,再次检讨了东汉时代关于官制的书籍,同时在《汉代古官箴》当中,对从西汉末到东汉时期关于官制的议论高涨这一现象,从时代性的角度进行了说明。在以上种种尝试的基础上,如能进一步掌握文献与其编纂背后的时代背景的话,就可以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文献史料。

关于东汉史的特质

下面介绍有关东汉时代特质的研究。虽然说是东汉时代的特质,但历史并非断代发展,所以只限于东汉一代的研究几乎是没的。但是近几年,认为西汉和魏晋中间存在着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时代的研究正在急速发展。很多研究把

从西汉末到东汉中期作为研究对象,如果把这样的研究也归纳于东汉史的范畴里的话,能举出若干优秀的论考。关于经学方面,保科季子的研究成果显著,在《天子好逮》和《汉代女性秩序》二文中,对西汉后半期皇帝和皇后并驾齐驱的形成过程和东汉中期皇帝一人独自为尊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充分的阐述。皇帝与皇后的对偶性并不是单独形成的,与其密切相关的进程是,皇帝(即天子),在与天下诸身份之间的相对关系中被重新定位。通过关于印制、绶制研究来解明这一过程的成果有阿部幸信《汉代官僚机构的构造》、《试论汉帝国内臣—外臣构造的形成过程》、《皇帝六玺的成立》等论文。保科、阿部的研究以经学和基于经学的制度为对象,而飯田祥子《前汉后半期郡县民支配的变化》和《关于后汉边郡支配的一个考察》二文则从更具体的支配形态来论述了这一时代的特殊性。以《汉代的长吏和属吏之间》一文为代表的仲山茂的一系列研究,说明了地方官府之间或者官府职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上述诸论考之间也有着深刻的联系。此外,对于西汉末至东汉中期的时代性的形成,王莽的影响很大。吉野賢一《关于前汉末年羲和的设置》、《关于前汉末年三公制的形成》二文和目黑杏子《王莽〈元始仪〉的构造》一文被认为是深入研究王莽所进行的诸改革和改革思想背景的杰作。根据这些研究可以明确,在西汉末至东汉中期的王莽和继承其路线的东汉王朝之下,皇帝制度、官僚机构、对外关系都被儒家思想所粉饰,在皇帝权力(不是唯一的绝对权力者)作为系列身份制度的顶点被相对化的同时,汉朝和围绕汉朝的世界秩序也作为儒家型的“天下”而被再次编成。伴随着这一潮流,这一时期的各项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相对于认为西汉末期具有划时代意义这一多数意见,小嶋茂稔则在东汉建国者刘秀及其集团的性质中寻求东汉时代的独特性。小嶋以《河北刘秀集团的确立过程》一文为开端,连续发表了关于东汉时代的论文(追记:这些成果已整理为《汉代国家統治の構造と展開》一书,于2009年2月由汲古书院出版)。从《汉代州制再考》、《后汉国制中“州”的位置》等题目来看,可以理解小嶋关注的是所谓“州”这一机构的存在。他在《汉代国家统治机构中亭的位置》一文中认为,由于作为地域支配关键的亭为州所掌握,因此东汉王朝的支配力能够贯彻到地方。小嶋主张,这样的地方支配方法,通过光武帝的度田和从州牧到州刺史的等级降贬等诸政策而被确立及固定。但是,关于光武帝、明帝时期的时代性质与以前的时代之间究竟有多大区别,今后在前面所举的论者之间还会出现各种

论争。

出土史料的利用

最后,介绍有关出土史料的研究。在文字史料方面,利用简牍研究的有石岡浩、高村武幸、水間大輔等。虽然多次论及东汉,但是因东汉时代的出土文字史料缺乏,这些讨论主要集中于秦至西汉时期。另一方面,画像砖、铜镜等东汉时期的非文字史料比较丰富,榑山満照《关于在四川制作的东汉元兴元年的铭镜》、菅野惠美《四川汉代画像砖的特征与分布》、菊地大《关于后汉、三国、西晋时期的五连罐、神亭壶的性格》、益満義裕《由猪所见中国古代的环境与历史》、江優子《关于汉墓出土的镇墓瓶》、鈴木直美《后汉图像所见六博》、上野祥史《汉墓资料研究的方向性》和《盘龙镜的诸系列》等论文,就是利用这些资料对东汉时代的地域、环境、世界观等题目进行的研究。日本近十年来开始关注这些以前从未被论及的问题。另外,也存在着不是直接利用出土史料,而是从出土史料中受到启发而进行的新研究。例如,山元貴尚《战国秦汉时代秦岭的交通道路》一文是研究地域间交流的代表性论考。前面提及的飯田祥子《关于后汉边郡支配的一个考察》和阿部幸信《皇帝六玺的成立》二文都提到了地域性的问题。在环境论方面的论述有大川裕子《中国古代的薯》和村松弘一《汉代淮北平原的地域开发》等。尤其是濱川栄,发表了诸多超越环境史的论考,如由有关环境的言说展开史料论的《关于围绕漳水渠建造者的两说》,由环境政策论及思想史的《五行志与沟洫志》,从与环境密切相关的各种人类活动来观察国家之成立的《黄河与中国古代史》等,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下倉涉《汉代的母与子》考察了母系的人际纽带,阿部幸信《燧人考》考察了人们对火的观念,阐明了当时人世界观的一部分。

除此以外,进行扎实的官制研究的有藤井律之《特进的起源与变迁》和渡边将智《两汉时代的公府、将军府》等。这表明传统的问题意识和手法直到现在仍然发挥着作用,青年学者们也稳健扎实地继承了这些学风。米田健志《汉代印章考》也可以被评价为立足于物品及其用法的基础研究。在学术史方面,青年学者馬場理惠子《“术数”概念的成立与汉代学术》等多以西汉为研究对象;而曾经在这一领域比较发达的是东汉研究,所以今后应该会出现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不过遗憾的是,近几年日本秦汉史的青年学者们对于社会经济史敬而远之,实际上也基本没有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柿沼陽平《秦汉时代的物价制度与货

币经济构造》一文,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在此,特别要指出的一点是,试图在中国历史或者世界历史当中重新把握秦汉时代,并把东汉时代定位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视点,在青年学者当中已经出现。例如,阿部幸信《匈奴关系所见汉朝支配体制的推移与确立》,这样视野广阔的讨论和前面所介绍的新研究、基础研究相互交叉,将来东汉史研究必定会有大的飞跃。虽然青年学者们之间的交流还不多,但随着今后国内乃至国际间交流的深入,我们期待研究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阿部幸信)

二、三国西晋史研究的新动向

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之中,三国、西晋史作为时代划分上的一个论争点,尤其以贵族制为中心,产生了为数众多的研究成果。这种倾向从1980年代开始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更是出现了新的动向。其中主要的研究方向可分为以下四点:贵族制研究的复兴,史料论研究的兴盛,军制、礼制研究的进展,利用出土史料研究的盛行等。以下就据此分类,特别以青年学者为中心进行总结。

贵族制研究的复兴

在战后的日本,围绕贵族制研究的议论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当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尤其盛行于1960~1970年代之间。但是,到了1980年代已处于停滞状态,进入21世纪后依然处于所谓“退潮倾向”之中。可喜的是,到2003年前后,这一方面的研究再次活跃起来。

发生这样的变化的原因可以举出以下两点:首先,1960~1970年代“贵族制社会”论的研究者当中,通过对内藤湖南的重新解读,出现了“追问贵族制研究”的研究动向。稍后又出现了以青年学者为主的对渡边羲浩“名士”论进行具体批判的现象。后一动向当中代表性的论文是村田哲也《关于“名士”论的一个考察》一文。对1980年代中期前后发表的渡边的东汉、三国史研究,一直以来就有很多批判。但是,对渡边的立论方法和“名士”概念的构造进行详细批判的还很少。因此,对于村田的详细批判,渡边到底如何回答成为关注的焦点。对于“名

士”概念进行批判的还有安部聪一郎《清流、浊流与“名士”》。此外,对渡边的孙吴政权论进行批判的还有满田刚《关于韦昭〈吴书〉》和落合悠纪《围绕三国时代江南豪族和“名士”的一个考察》。

村田的批判以1960~1970年代盛行的“贵族制社会”论的成果为基础。安部的批判也具有同样的方向性,但是并不局限于“贵族制社会”论,对1970年代以前贵族制论争的成果和1980年代以后渡边等的议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整理,在把两者作为同一研究史进行把握的基础上加以批判性地继承。这种努力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也是应该得到延续的。

史料论研究的兴盛

根据史料书写当时的政治、社会状况,特别是史书编纂者所处的状况,来重新理解史料,在由此所得新见的基础上,重新检讨过去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方向在近几年较为盛行。成为这一研究方向代表人物的有安部聪一郎、津田资久、满田刚、永田拓治等,研究倾向性略有不同的还可以举出田中靖彦和佐野诚子等。

斟酌史料的作者以及书写时代,从而进行史料批判,这本是历史学的基础,自然一直以来都受到重视。比如,越智重明的研究就极其重视这种研究方法。如果举出过去的研究和以上所述近几年的研究之间的差别的话,应该说后者是以特定的史书、文献,特别是正史的整体为对象,探求其构造、性格、执笔意图,并以此为起点试图进行史料的再解释和历史图像的再构筑,将此作为明确的目标进行研究。过去的贵族制研究已经把贵族伦理和精神性作为一个焦点,具体有安田二郎等试图从文献性格当中捕捉贵族心性的研究。在这种直接影响下,上述研究方法在日本的青年学者当中广泛流行。进一步从全盘来看,日本的日本史学、西洋史学当中社会史研究的盛行和文学研究当中文本论的展开也有巨大的影响。如此看来,在整理各种研究动向之时,举出佐野等中国文学学者的研究也是很自然的。

即使是达成共识的学者们,在具体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关注的领域上也有较大差别。津田在《陈寿传研究》、《〈魏志〉帝室衰亡叙述所见陈寿的政治意识》二文中,从《三国志·魏志》中解读了陈寿的政治立场,并从此点开始论证西晋政治史。其后他通过《汉魏交替期〈皇览〉的编纂》、《曹魏至亲诸王考》、《〈曹真残碑〉考释》追究从汉魏交替期到魏晋交替期的政治史。其研究对象逐渐就石

刻、经书等史料而展开,也是值得注意的。如接下来将要介绍的小池的研究那样,基于史料论,并进一步与石刻、出土文物进行比较,或者反过来把这种研究方法应用到石刻、出土文物等的研究当中,这种研究动向在这数年中变得明显起来。满田也通过《关于韦昭〈吴书〉》、《诸葛亮歿后的“集团指导体制”和蒋琬政权》、《关于蜀汉·蒋琬政权的北伐计画》等著作,对史书编纂和三国吴、蜀政治史的关系产生了兴趣。小池直子《贾充出镇》和《贾南风婚姻》等虽然不是对史书直接分析的研究,但也特别留意了《晋书》的性格,石刻史料等亦成为其研究对象,基于此对西晋政治史进行了论述,可以认为是方向性相近的研究。相对于以上这些以政治史为主的研究,安部聪一郎《党锢“名士”再考》在特定的史书之外,更着眼于史料成立时期的不同和文本之间的矛盾、差异关系,并以批判性地继承 1960~1970 年代以来的贵族制研究为主要目标。永田拓治《〈先贤传〉、〈耆旧传〉的历史性格》从地域性等社会性的侧面来研究《先贤传》、《耆旧传》的编纂,并把关注点转移到时代性特质上。这些研究更加倾向于追究社会性的侧面。有学者指出,史料论研究需要首先确立使用史料的方法论;但是,由于个人的关注点和研究方法等的不同,或许应该首先在具体研究上做有效检讨,深化理解,方法论的确立可置于其后。

军制、礼制研究的进展

军制研究和礼制研究,与贵族制研究的停滞交替,可以说是 1980 年代后盛行的研究领域之一。在军制方面有石井仁,在礼制方面有小林聪等主要学者,而在青年学者当中,军制研究方面首先可以举出的是森本淳和山口正晃的一系列成果。森本淳《试论曹氏政权的崩坏过程》、《关于曹魏、西晋时期的中级指挥官》、《曹魏时期的刺史和将军》和山口正晃《都督制的成立》这几篇论文,连贯地论述了自东汉末至西晋时期的都督制。关于吴国军制方面,还有村田哲也《关于孙吴政权军制的一个考察》。考虑到在东晋、南朝研究中军制研究也占有重要地位,也许我们能预见这一研究领域在今后会有更加深入的发展。关于这个问题,后面由山口进行具体介绍^①。

与军制相比,不得不说以青年学者为主的礼制研究的成果较为缺乏。但是,

^① 山口报告《魏晋南北朝时代军制研究的意义》亦收入本卷会刊。

如之前提到的津田资久的研究那样,在政治史、政治构造的研究当中,还有在与法制相关的研究当中,处理经书和礼制方面的内容在增加。可以认为,这样的研究在今后会更加深入地发展。

利用出土史料研究的盛行

利用出土史料研究的急速兴盛是进入 21 世纪之后的事情。利用的资料不仅仅是石刻、简牍、镇墓文等文字史料,还涉及画像砖和神亭壶等遗物。其中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公开,可以说对于这一领域的兴盛产生了很大影响。关于走马楼吴简的研究动向已经有了介绍,因而在此没有必要详细解说。在这里仅列举作为新的研究方法的尝试性研究,特别是阿部幸信、伊藤敏雄编(関尾史郎主编)《嘉禾吏民田家菑数值一览(I)》和阿部幸信《小型竹简与早败率所见“丘”》,还有以走马楼吴简作为研究题目中心的谷口建速《从长沙走马楼吴简来看孙吴政权的谷物搬出系统》、《长沙走马楼吴简谷仓关系簿初探》等。

关于石刻,有上面所列举的津田和小池的研究,利用画像砖的研究有市来弘志《画像砖所见魏晋时期酒泉的家畜和牧畜》。也有必要关注菊地大关于五连罐与神亭壶的文章《关于后汉、孙吴、西晋时期江南地域所见五连罐、神亭壶》和《五连罐、神亭壶的人物装饰和后汉、三国、西晋时期的江南地方祭祀》。另外,室山留美子在《中国墓葬文献目录(三国两晋南朝编)》一文中收罗的关于墓葬发掘报告研究的相关目录,一定会对以后的研究起到很大作用。

沿袭政治、社会、经济各领域中所积累的研究方法来利用石刻、遗物等史料,这一倾向是比较明显的。以上所举出的诸研究之中,有很多使用了这样的研究方法。市来和菊地的研究在具备此倾向的同时,也关注地域性的特点。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整体上重视地域性的倾向从 1980 年代开始变得显著。利用出土史料的研究也包含了以上诸论,在观察今后的研究动向时也应该关注。关于走马楼吴简研究,随着史料的逐步公开,期待出现更多的论点。

虽然是从以上四点进行了分类总结,但也如上文中多次涉及的那样,这些论点实际上是相互关联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新的研究动向。笔者的兴趣,稍偏向于贵族制研究和史料学的研究。当然,如礼制研究对于这些论点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对此没能充分总结,我感到非常抱歉。

(安部聡一郎)

三、东晋南朝史研究的新动向

对于东晋南朝史中贵族制和侨州郡县制研究的重要性,没有必要再重复。近几年还看到了一些基于这些研究成果之上而试图解明南朝国家特质的论文。下面就想以这三点为主进行介绍。在关于东晋南朝史的研究方面,青年学者的研究比东汉、魏晋、北朝要少。因此在这里也一并介绍对青年学者具有很大影响的资深学者的研究。

贵族制

首先,是关于贵族制的研究。越智重明曾经在《曹魏西晋贵族制论》中提到,没有必要过分评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贵族世袭制,认为这种评价有碍于解释皇帝权力的问题。对于这一观点,谷川道雄在《六朝贵族制社会的历史性格与向律令体制的展开》中进行了批判,认为“要是根据越智氏的看法,就不能研究清楚六朝贵族制的特质”。之后,日本的贵族制研究成为了极为精细的研究。但是,与贵族制研究相比,越智所说的皇帝权力的问题,还存在很多未被解明的地方。

近几年,川合安也提出了与越智同样的见解。他在《南朝贵族的家格》、《南朝官人的起家年龄》、《关于门地二品》等文中认为,在南朝,门第的固定化也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主张应该从二千年中国帝政中一直存在的身份固定性的弱化这一特质来理解南朝时代的贵族制。

另一方面,所谓“门第”,也并非自古即如此,有必要解明其发生固定化的时间与方式。渡边羲浩在《“史”的自立》中,通过对个人的人物传,尤其是别传的考察,论述了门第问题。作为决定门第的重要因素之一,渡边氏举出了谱学和别传。认为刘宋以后,贵族意欲通过独占这些关于谱学和别传的知识,来巩固自己的门第。贵族独占这些知识的活动,为什么发生在刘宋以后,这是在以后的研究当中需要阐明的问题。

东晋南朝的官僚制当中,存在与国家制定的官品不同的序列。这就是官之清浊的区别,是为贵族所重视的序列。梁武帝进行了天监官制的改革,制定了统合官品和官之清浊的新的序列,也就是班制。岡部毅史在《关于梁陈时代将军

号性格的一个考察》一文中认为,唐代的散官受到梁班制的影响,表示位阶高低的不是官品,而是官名。《关于晋南朝的免官》和《魏晋南北朝官制中的“阶”与“资”》主张随班制的施行,表示历官累积的官资,作为人事的基准而增强了重要性。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商务印书馆,1944年)中曾指出,隋唐受到了南朝诸制度的影响。岡部的研究认为南朝的班制影响了唐代的散官,从这一点上补充加强了陈氏的观点。

关于礼制,石井仁在《虎贲班剑考》一文中指出,虎贲班剑(晋代以后,宫廷中使用的木制刀剑)是军权的象征,虎贲班剑的赐与表明把军权转让给了臣下。赐与虎贲班剑的次数在晋代比较多,但是刘宋武帝、孝武帝为了强化皇帝权力,限制了赐与的次数。小林聪《关于汉六朝礼制与官制关系的一个考察》、《西晋礼制秩序的构筑》、《从秦始律令到天监律令》、《关于梁武帝礼制改革的特质》认为,秦始礼制是向周制的回归,与此相对,天监礼制则强调了天子的至高性。

关于文书行政,野田俊昭曾在《东晋南朝天子的支配权力与尚书省》中指出,在东晋南朝,尚书省拥有案奏制作权,贵族通过案奏制作权把自己的意向反映到政治当中,刘宋孝武帝之后,案奏制作权被皇帝收回,等等。野田的论文明确了贵族制和文书行政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村圭爾《魏晋南北朝公文书的种类和体系》一文进一步深化了野田的主题,是全面考察魏晋南北朝时代文书行政的精心之作。

侨州郡县制

其次,是关于侨州郡县制的研究。安田二郎在《侨州郡县制与土断》中提出,侨民(来自华北的难民)在东晋中后期负担着兵役。安田氏的见解显示,侨民作为兵户、白籍户成为东晋军事力量的主体。安田的论文成为今后研究侨州郡县制问题的必读论文。侨民负担军事力量的体制经过王敦、苏峻之乱而确立。三田辰彦在《东晋的琅邪王与皇位继承》中指出,因这次叛乱出现了东晋皇帝和皇太子死亡的可能性,为了防备这种事情发生,琅邪王具有了作为皇位候补人选的功能。小尾孝夫在《刘宋以后北府兵军事地位考论》一文中,分析了北府的集兵方法,认为北府在刘宋以后依然维持较强的军事力量。

关于北来士人和江南士人的关系,永田拓治在《〈先贤传〉、〈耆旧传〉的历史性格》中认为,东晋时期,江南士人应该是抱着对抗北来士人的心态创作了《先

贤传》和《耆旧传》，以强调江南地域的优越性。田中靖彦《〈汉晋春秋〉所见三国正统观的展开》、《东晋初期的孙吴观》指出，江南士人在政治上的“不遇”影响了《汉晋春秋》、《搜神记》的记述。山崎益裕在《南朝的文化对立与政治背景》中指出，东晋以来，乐府民歌中存在重视华北文化（《诗经》）和重视江南文化（《楚辞》）这两种立场，而刘宋孝武帝重用了持有后者立场的文学集团，宣扬了江南文化。

南朝国家的特质

最后向大家介绍考察南朝国家的特质的诸论文。中村圭爾在《南朝国家论》中指出，在中原看来，东晋南朝只相当于边境的江南，从而不能主张中原王朝的正统性，为了克服这样的地理性边境，南朝国家进行了文化传统或礼制的整备。进一步阐明正统性问题，在思考南朝国家的特质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南朝政治史，川合安在《刘裕革命与南朝贵族制》中认为，刘宋武帝因政治基础不稳固，图谋收揽贵族官僚层。嶋田さな絵《刘宋建国期的“隐逸”与政治权力》也认为，刘宋武帝积极收纳了江南士人。小尾孝夫在《刘宋前期的政治构造与皇帝家的姻族、婚姻关系》中论述了刘宋武帝、文帝重用贵族、寒门出身的姻戚。川合安在《〈宋书〉和刘宋政治史》中指出，刘宋孝武帝为了强化皇帝权力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革，前废帝也在政治生涯的后半段继承了孝武帝的路线。从以上四篇论文可以看到，从刘宋武帝到孝武帝时期，皇帝权力得到了强化。

关于军事制度，小尾孝夫在《刘宋孝武帝的对州镇政策与中央军改革》中认为，刘宋孝武帝通过以中央军改革来压制州镇等手段，强化了皇帝权力。戸川貴行在《关于魏晋南朝的民爵赐与》中指出，在刘宋孝武帝以后的南朝，以每三年一次的频率赐与民爵，多于汉代的每五年一次的频率。又在《关于刘宋孝武帝的户籍制度改革》中指出，刘宋孝武帝施行了征兵制，并为了褒赏征兵的军功而恢复了民爵制度。

关于国际关系，这里省略东亚全体研究，只介绍南北关系。北村一仁《南北朝国境地域社会的形成过程及其实态》和《关于南北朝时期“中华”世界中“蛮”地的空间性》认为，南北朝时期的国境地带是皇帝权力未能达到之地，是拥有独特秩序的地带，换句话说，它具有避难所（Asyl）的性格。堀内淳一在《南北朝使节所见“文化”的多样性》和《马和柑橘》中指出，南北朝的外交关系到国